

国家彩票公益金资助

大字版

【十三经开讲】

穀梁传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 主编
谢金良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十三经开讲】

穀梁传开讲

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谢金良◎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穀梁传开讲: 大字版/谢金良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15. 11
(十三经开讲/张善文, 马重奇主编)

ISBN 978-7-5002-6444-6

I. ①穀… II. ①谢… III. ①中国历史—春秋时代—史籍
②《穀梁传》—研究 IV. ①K225. 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5300 号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中国盲文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大字版。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穀梁传开讲 (大字版)

主 编: 张善文 马重奇

著 者: 谢金良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6444-6/K·321

定 价: 36.00 元

销售服务热线: (010) 83190297 83190289 8319029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十三经开讲》修订版弁言

张善文

费时半载，《十三经开讲》终于修订告成，有以呈献于读者了。

这是一套以浅显简易的语言述谈十三经的小型丛书，旨在与当今的青年读者共同研讨这十三部极具历史文化意义的中国古代经典。全书沿承“开筵讲习”的传统教学理念，力求遣词平白，用语轻松，于素淡通俗的氛围中展示经典深永奥雅的学术精神，故题曰“开讲”。

此书十五年前曾以《十三经漫谈》为题，由台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在台湾学界产生过较为良好的学术影响。今复作全面修订，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改版刊行。本次修订，除了更名为“开讲”，将繁体字改为简体之外，另有如下几方面侧重把握：即细校引文、详审观点、润色辞采、充实资料、增补内容，总以严谨缜密为本，期盼推出一套精益求精、富有启迪意义的十三经入门读物，以裨益于学术教育界，繁荣并发展今日国学研究之芬馨文苑。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序有云：“经禀圣

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这几句评述尽管带有往昔学人的尊经心愆，但还是颇为客观地说出了“经”的至为崇高的历史地位，值得我们平情思量。毋庸置疑，中国古代经典的浑厚悠远的学术价值，仍期待着众多华夏学人的不断研探与发掘，其永恒的思想晖光必将更加灿亮地映照于人类学术文化之林。

二零一三年三月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

总 序

张善文

十三经者，我国五千年悠久辉煌的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精粹的十三部经典著作之总称。

先师黄氏六庵教授（讳寿祺），昔有《群经要略》之作，其书《自序》尝综述诸经之特色云：“余以《尚书》为吾国最古之史，亦吾国各体散文之祖；《诗经》为韵文之渊藪；《春秋》为记事之宝书，此三经于文史关系最钜。”又曰：“近世《礼》学废绝，专业者至稀，而讲《孝经》者亦每失其义。《论语》、《孟子》支配吾国人思想者垂二千年，昔则家弦户诵，今至大学文史系学生竟罕能举其篇目。《尔雅》关乎文字训诂，不识字何以读书作文？”又曰：“独《易》道广大精微，见仁见智，无体无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不为典要，惟变所适，初学难以极深研几。”这几句话十分精辟地点明了群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内容特色，并指出近世学者对经学研究的荒疏与缺陷，其言辞之间，不无激励后人当珍视国学而努力研治之良苦用心存焉。

一九九三年夏末，我与罗萤兄赴台湾访学，幸识台

北顶渊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陈清荣先生，与之论及中国经学后继乏人的现状，并提议倘能编撰一套简说十三经要义的普及丛书，必将引发今日青年一代治经的兴趣，且将有益于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之千秋大业。陈先生闻毕此论，至为赞许，嘱我及早安排编撰事宜。是为《十三经漫谈》之最初编撰缘起。

越二载，一九九五年初夏，我以出席台湾大学与台湾易经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之机再度赴台，又趁暇与陈清荣先生深入商讨《十三经漫谈》的编写步骤，承其全力支持，遂落实了此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规划。是年回福州后，我即邀马兄重奇教授共同担任主编，并请罗萤、郭丹、徐启庭、翁银陶、徐六符、汤化、陈节、林志强、黄黎星、刘松来、谢金良、杨志贤、巫少鹏、叶全君等诸位同仁分经撰写，历时一载有奇，经过多次研讨商榷，今喜各书已相继完稿待梓，而诸位撰稿人所付出的努力亦将转化为有补于社会教育之学术成果矣。

中国古代之言“经”者，乃典型常久之谓，故“经典”二字常被联用，而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遂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先秦时代，我国有六经之书，即孔子授徒所用的《周易》、《尚书》、《诗经》、《礼经》、《乐经》、《春秋》六

部典籍。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乐经》亡佚，故西汉复兴经学，仅立五经博士。稍后又曾将《论语》、《孝经》增列为学官讲经之典籍。及至唐代，学官所立，于《礼》中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于《春秋》中分《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乃成九经；嗣又增入《论语》、《孝经》、《尔雅》，皆刻石于国子学，于是有十二经之名。有宋一代，程颐、朱熹诸儒出，更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配《论语》、《孟子》而合为一帙，谓之《四书》，则《孟子》亦入“经”矣，此后风行天下之十三经遂以《孟子》殿焉。明清以降，尤其是清代学者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之后，这十三部经典更进一步受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重视，乃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最集中、最深邃、最典型的象征。

略考十三经之编次，依前儒成例，分别为：《周易》第一，《尚书》第二，《诗经》第三，《周礼》第四，《仪礼》第五，《礼记》第六，《春秋左传》第七，《春秋公羊传》第八，《春秋穀梁传》第九，《论语》第十，《孝经》第十一，《尔雅》第十二，《孟子》第十三。本丛书的编纂，即以此为序。各书的撰写，力求简明通俗，浅显生动，言之有物，以合“漫谈”之宗旨。然因诸经原有深浅难易的区别，加以撰稿者分析角度的差异、行文风格

的不同、学术水准的未臻一致，或许仍存不少不尽如人
意之处，凡此，则至盼读者及学术界各领域之大雅君子
的不吝赐正。至于整套丛书面对今天的青年读者，以向
他们普及中国经学常识的撰述原则，我想各书的作者一
定是兢兢业业地认真把握的。

欲治中国学术者，必自群经始。但研治经学绝不可
盲目，务必明确入门的途径，掌握正确的治学方向，才
能自立于学术界而有所建树。此即宋儒程颐所谓“见得
路径”，“立得一个门庭”之意。先师六庵教授于民国二
十九年（1940）在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演讲《论易
学之门庭》时，曾强调指出：

读经须先立得门庭。所谓门庭者，便是从师讲
问如何下工夫，如何读书。再伸畅其说，便是凡治
某一种学问，必须求师指导一了当之途径，使不至
迷罔眩惑。若不知要领，劳而无功也。（见《周易研
究论文集》第一辑，黄寿祺、张善文编，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

先师之学源于章氏太炎先生，为章门再传高弟，曾受业
于礼学名家吴检斋（承仕）先生、易学大师尚节之（秉
和）先生等学界宿儒，其所论析研经之道，允为前辈学
者治学的至理名言。今值本丛书完稿之际，谨以先师的
教诲奉献给有机会读到本书的朋友们，庶可与他们共勉，

也期望本书对年轻读者研读十三经有较多的帮助，更期望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跨世纪的新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瑰丽的学术之光！

公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九日

岁在夏正丙子大暑后七日

前言

人类正在加紧走向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也必将走向全球化。纵观当今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早期的几大灿烂文明中得以长存并不断发扬光大的传统文化寥寥无几。中国文化是目前世界上影响人口最多的，也是流传得最为广泛和久远的优秀文化之一。作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与相邻的印度文化、日韩文化、伊斯兰文化等水乳交融，成为足以与欧美等西方思想文化形态相媲美的代表性文化。随着西学东渐、西学中用的脚步加快，中国文化的深层潜力越发表现出和谐相融的思想魅力，正在引领人类走向共同繁荣发展的文化圈。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些人随便轻易创造的，而是蕴涵着无数中华贤哲几千年来的辛劳与智慧，是真正久经考验而能历久弥新不断与时俱进的特色文化。因此，研究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在当下的学术进程中显得尤为必要，对文化的繁荣、民族的交融、人类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和平也都是大有益处。当然，正确理解

中国文化的重要典籍，也是尤为必要的，不啻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前提和关键。

一、中国文化经典研究总体回顾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典籍浩繁，流派众多，影响广泛。中国文化产生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史前时期，随着时代和地域的改变而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远在传说中的伏羲画卦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思维模式雏形出现，于是以阴阳相互关系为思辨对象的中国文化就正式走进历史。经过史初无数先祖的经验与实践，逐渐形成了以崇尚阴阳和谐互动的《周易》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引领了先秦诸子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使中国文化显得更加悠久和灿烂。春秋战国时期的六经和诸子思想文化，既是对中国远古漫长历史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也是对当时各种现实问题的积极思考和应对，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研究源源不绝的根源和动力。毫无疑问，中国文化传统是立足先秦经学和诸子文化而形成的，中国文化研究和发展也始终没有离开先秦文化经典。因此，溯本求源，从先秦文化经典开始，正确理解先秦时期的主要文化典籍，才是中国文化研究的正确门径。

回顾中国文化研究，历史漫长，情况复杂，问题繁多。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始终是在探究中前进和发展的。从圣人画卦到工具发明，从神农尝百草到黄帝出

《内经》，从八卦通物象到仓颉造汉字，从史巫测日占卜到《易经》卦爻辞面世……种种传说或史实表明，史前的华夏祖先不断运用阴阳辩证思维创造文明的奇迹，不断在研究中推动华夏文化走向辉煌。那是一段几乎没有文字历史的历史，有幸的是，近百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让人得以见证当时文明的程度。当夏、商的青铜文化鼎盛至极时，铁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化又迅速翻开崭新的一页。自西周以来，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社会文化领域也相应发生变化。至少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许多文化品种和特色都已经形成，在满足衣、食、住、行、礼、记、医、卜方面都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并形成以中正和谐为审美特质的文化模式。流传至今的先秦五经和百家经典，不仅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思想的成熟，文化的多样，也同样诉说着一个民族文化形成和崛起的不平凡历程，并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几种面向。

一种面向是先秦五经典籍在持续不断的研究中变异和创新。尽管经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或载之竹籍或口耳相传的《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种重要经典，还是以顽强的生命力延传到汉代。尽管因此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但仍无碍于儒家经典长期立于学官成为显学，甚至有助于独具中国特色的经学文化长盛不衰。师法和家法的门户之见，抵挡不了思想文化的交

融和合流，于是儒家经学文化史上依旧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高潮迭起。即使多了道与佛的参合，儒家的经典文化仍然魅力不减，甚至是得以洗心革面，胜过从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文化，在道学与佛学文化的配合下，逐渐形成今日以儒道佛文化为核心的多样统一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难发现，中华文化的正统是以先秦五经为代表的典籍文化——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以儒、道、佛的典籍为重要组成部分，囊括其他各种历代百家图籍所形成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文化。典籍文化见证了中国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思想文化的发展——先秦子学、汉代经学、六朝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实学；也包容了儒、道、佛等宗教文化的发展，甚至由此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为雕刻、印刷、造纸、装帧、校勘、收藏等，而研究方式则是不断围绕典籍文本的传、笺、音、注、疏、解、释、考、辨、正义、本义、阐解、集注、集解、校释、辑佚、丛编、目录、版本、校勘、音韵、典故、类书、引得等。因此，研治中国文化离不开古代典籍，也离不开传统的治学方法。

另一种面向是源于上古的史官文化而秉承《春秋》史书传统开创的。中国自古及今有修史的传统，《尚书》开其先河，《春秋》成编年体例，《史记》创正宗历史，《汉

书》始以断代，自《清史稿》出，中国拥有纪录完备的正史凡二十五部，还有许多私人著述的野史，以及各种地方志、谱牒、碑记等，朝代分明，卷帙清晰，包罗万象，巨细无遗，造就了洋洋大观的中国史籍文化，使之真正成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国度。透过史籍文化，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礼节民俗、重大事件、科技发明、稀奇怪事、名人传记等，可以以古鉴今和继往开来，由此梳理中国文化发展的来龙去脉，谱写无数动人的古代中国传说。因此，研治中国文化必须依托中国历代的史籍，才能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

还有一种面向是延传诸子百家的言说思维方式而开启的私人著述文化。著述文化与典籍文化、史籍文化是有相同之处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典籍与史籍文化属于官方主流文化，那么著述文化则属于民间的非主流文化。著述文化的范围无疑是广泛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既有围绕经典的阐说，更有个人的心得笔记、事迹传闻、独门绝招、文学创作、思想主张，往往能补正史典籍之偏颇与不足，亦能具体再现某家某派的独特与创新，不失为文化研究最好的佐证材料之一。因此，研究某一特色的中国文化，必须尽可能掌握相关的著述文化典籍，方能更加客观真实地看清事相缘由。

以上三种不同的面向，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共同推陈

出新，谱写了中国文化的新篇章，留给后人的既有汗牛充栋的古籍和纷繁多样的文化，也有神奇独特的魅力和经久不衰的精神。在这些不同路向的研究中，古代学者大多是在传承中开新，在解读中阐理，在阐释中立论，没有单纯的理论著作，也没有纯粹抽象的思辨见解，甚至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这是与西学大相径庭的！尽管其中沉淀着学术思想的陈腐，但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让人如沐春风般陶醉在和缓舒畅的美梦里，真似“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南宋叶采《暮春即事》）。也许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许多学者还是以阅读中国古书为乐，从中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明心增智，自然达到养生养性而快活长乐的境界。

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研究仍在延续三种面向，但有根本性改变。主要是儒家思想衰落，经学开始缺席，呈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文化格局。西学的引进，逐渐改变了以往的研究方式，出现了以学科理论思想为平台的研究模式，并开始运用西学的理论作为评价中国文化学说的标准直至今天，也因此衍生了许多高倡西学精神的文化产品，导致了中国文化研究近百年来的衰退。尽管出现了一批新儒家代表人物，但其影响一直都是有限的。从整个过程看，即使西学也占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中国化了。于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

态出现了，甚至延续到今天。从清末以来，出现了一批提倡中国学术文化力图补偏救弊、革新治国的国学大师，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徐复观、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张岱年等，这些人大多有一定西学背景，见解独特，著作等身，都是对中国学术文化深有研究和建树，自成一家，影响深远。这些大师的著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崭新代表，也是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逾越的门槛。

而在大师稀缺的当代，尽管缺乏学界的领袖巨擘，但也不乏学者精英，更加具体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海外的中国学和汉学研究，方兴未艾，也同样取得很大的成就。无论是研究项目的规模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广度，从整体上看都是超越前人的。尤其是新的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先进科学技术、新的出土文物材料、新的交相比较思维、新的教育科研机制，使得文化研究空前繁荣，成果日新月异，局面前所未有。一个没有大师、呼唤大师的年代，反而造就了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尽管其中仍不乏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但创新性开拓性的成果还是不少的，这也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化，既要倾听那些权威大师的言论，更要关注一些名家名作以及一些富有代表性的力作。

反观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根本